

這是一次訪問的「副產品」。而且，嚴格意義上說，也只是閒聊。對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的嚴肅的學術研究，有待於文學史的專家做進一步的實證描述和理論開掘。

這裏提供的只是一個線索。

問：戰後香港文學的發展歷史，您既是參與者又是見證人。您能不能概括一下它的基本脈絡？

答：四十年代我僅僅是個文學青年，喜歡寫小說，又在辦一個出版社。那個出版社

# 「本地意識」和「本土文學」

## 訪劉以鬯談「五十年代香港文學」

楊素



只出文學書籍，出過徐許、姚雪垠等的雜志。那時我不少計畫，想出版文學叢書、文學雜誌。我「直夢想辦一本像三十年代施蛰存主編的《現代》那樣的純文學刊物。抗戰結束後，我從重慶回到上海，先在報館編副刊，後來辭去報館工作，創辦出版社。四七、四八年百物騰貴，通貨膨脹，白報紙放在倉庫屯積，比書還要值錢，印書幹甚麼？在上海無法發展，我就到香港來考察一下它的市場，沒想到一來就是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是個文學追求者，從來沒有離開過文學。對香港文學走過的路，了解比較多一些。我覺得，香港文學的轉捩點，發生在一九四九年。

問：大陸的文學史研究者通常把這一年作為大陸「當代文學史」的起點。台灣似乎也有這樣的劃分。港台大陸不約而同地都把它這一年作為本地文學發展的關鍵，可見政治對文學影響力是很大的。

答：不完全是政治。我覺得，香港文學的本質在四九年發生轉捩，在外貌、內容上出現很大不同，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本地意識」覺醒的結果。

問：四九年以前的香港作家沒有本地意識？

答：或許也可以說，四九年之前根本不存在所謂「香港作家」。雖然香港自世紀就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成爲一個英國殖民地，但這裏並沒有發生過本地蓬勃的文學運動。許多在香港很活躍的作家，辦雜誌，寫文章，都是中國文學運動的一部分。從三十年代起，就有很多成名作家來到香港，如茅盾、葉靈鳳、葉君健、馮亦代等等，很多了。他們大都是「進步作家」，來到香港，只是避難，或者路過。有的是因爲戰爭關係，抗日戰爭國共戰爭，有的是因爲其他原因。

問：這些作家在香港寫的作品，很少有一本地意識。即使像端木蕻良、蕭紅這樣在香港寫過很好的文章，也編過雜誌，照理應該對香港文學有所貢獻的，但從他的文字裏可以看出，他們其實並不關心香港。

問：很多作家後來編文集、選集，把他們在香港寫的作品編進去，大陸的「現代文學史」分析到這些作品時，從來沒有把它們當作「香港文學」來討論。在文學史的研究者看來，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答：情況是在四九年發生改變的。在四九年之後，大部分「進步作家」都先後北上，回到大陸去了。與此同時，另一批作家則從大陸來到香港，開始他們在香港的文學活動。著名的有曹聚仁、李輝英、徐許、易君左等等。葉靈鳳來得早，沒有回去。

問：有一些甚麼改變？

答：最初，還沒有太大改變。香港文學的改變不是突然的，經過了一個時期的變化。五十年代初期，有所謂「綠背文學」。幾年前，中文大學有個「香港文學研討會」，提到「綠背文學」。有的人不明白，要我解釋。因爲我不是講者，我沒有講。當時在香港文學界做過事的都知道甚麼叫「綠背文學」，它是根據一個英文詞翻譯過來的，GR-

GREEN BACK，就是「美鈔」。美國人一般稱美鈔爲GREEN BACK，就像香港人稱十元港幣叫「青蟹」、百元港幣叫「紅衫魚」一樣。四九年以後，幾乎整個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綠背」的影響相當大。有許多入領高報酬，寫了很多文章，做「政治的揚聲筒」。當時有許多出版社會美金津貼，如友聯出版社。當時的《人人文學》（五二年五月創刊）雜誌和《中國學生周報》（五二年七月創刊）也同是「綠背文化」的產物，有政治目標而不太重視商業利潤。當然，在客觀上，《中國學生周報》曾培育過不少香港本地的文學新人，《人人文學》也對當時年輕一代的文學愛好者起過刺激作用。

問：有一些甚麼值得注意的作家及作品？

答：我寫過一篇論文，《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當時在文學上比較有影響力的，在派是侶倫，他一直没有回大陸。雖然也是「爲生活而寫作」，但態度比較認真，無意將自己的小說成爲純消遣品，而且他的小說大都以香港生活爲內容，有較濃的香港味。他的《窮巷》在當時是較出名的。和左派對峙的是徐許。他和我關係較深。當年在上海辦過正文化出版社文學叢書，第一本就是徐許的《風蕭蕭》，後來選出了他的《三思樓月》。到香港後，他的產量比較多，但大多還是以前在大陸時那種小說風格，有點「洋囂囂蝴蝶派」的作風，也有寫得用功的，至於「質」的方面有待批評家去研究了。李輝英和曹聚仁也寫過一些較好的小說。當時，有兩部小說相當受人重視。一部，是五三年出版的趙滋蕓的《半下流社會》；另一部是洛風的《人渣》。這兩部小說都是寫香港「白華」生活的，不同的是前者寫香港難民營中「低等難民」的生活，後者寫香港「富戶區」內「高等難民」的生活，有宣傳政治的目標。而當時最受讀者歡迎的，大概是徐許的長篇小說《星星、月亮、太陽》。不過，有評論者認爲這部小說受姚雪垠的影響。

問：這本小說似乎直到現在坊間還有賣，說明現在還有讀者看它。這種現象或許也只會香港獨有？

答：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是寫抗戰時重慶撤退的故事，寫了三個女人，用星星、月亮、太陽來分別象徵這三個女人的個性。徐許的《星星、月亮、太陽》寫的也是抗戰故事，也寫三個女人，也都是從事抗日工作，名字分別也叫星星、月亮、太陽，而且索性用這三個姓名當作書名，無可否認是受姚雪垠影響。事實上，當時已經有人寫過一本書討論這個問題。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在藝術上比較成熟，當時在香港也有翻版，但銷路很差。而徐許的《星星、月亮、太陽》銷路卻好得不得了。這一點也說明讀者的判斷力有時並不準確，用銷量來衡量作品的文學價值是靠不住的。有時，確實不能要求廣大的讀者群能夠很理性地對待純文學作品。大多數讀者是帶着消閒的心理，不會去考慮結構怎麼樣，人物刻劃怎麼樣，有甚麼文學價值。

問：當時從事純文學創作的作家恐怕多

少要爲市場做出某些犧牲？

答：那是肯定的。大多數作家爲了生活，不得不迎合市場的需求。當時有一種較流行的「都市傳奇」，雖然沒有甚麼文學價值，但可讀性高，有的也能用簡潔的文筆去表現香港社會特有的色彩和節奏。但後來愈寫愈濫，甚至將外國的小說改寫，使它迅速失去吸引力。一般大眾的閱讀興趣也就轉移到了趣味低級的黃色文字或沒有藝術價值的東西。

問：純文學的雜誌也很難生存下去的罷？

答：在商業社會永遠是這樣的。有一本比較嚴肅的《幸福》雜誌，本來在上海出版，五零年七月以後在香港出了四期，對香港文學的延續做了一番努力。主編沈寂是從上海來的，後來和劉瓊、舒適等組織讀書會，港英政府說他們有政治問題，把他們驅逐出境，趕回大陸去了。



版權爲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